

## 前 言

---

“趋同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它于本世纪 60 年代产生后，在国际社会中泛流，并极力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近几年来，我国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把改革引向邪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宣传“全盘西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趋同论”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力图先与资本主义“趋同”然后进到与资本主义混同，曲线实现“全盘西化”。而且，“趋同论”同“全盘西化论”比较起来，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其一，从表面上看，它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都是有褒有贬。这既迎合了某些主张对社会主义的“弊端”进行“反思”的人的需要，又迎合了某些主张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求可供“借鉴”的经验的人的需要。这使这两种人都容易为“趋同论”所感染。他们视“趋同论”为“公允”的、可以使人“免走极端”的理论。其二，“全盘西化论”在中国现代史上几度出现，也几度被国人批得体无完肤，其殖民主义的实质也遭国人唾骂。“全盘西化论”已没有任何新鲜的理论色彩，也没有多大的市场了。而“趋同论”则不同，它不仅是刚刚发展起来的“新理论”，而且其内容与形式都

颇有“魅力”。它抓住了或者说是迎合了当今人们的心理状态。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有一些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头脑中产生一种天真的幻想：如果有一种未来社会，既能摆脱两种现存制度的弊端，又能保留它们的长处，岂不美妙！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一些人相信“趋同论”的“新思想”。搞自由化的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就扛起了“趋同论”这面旗帜来挥舞，企图使人民跟着他们走。有一段时间内，“趋同论”在我国确实有些时髦、相当活跃。他们提出了两种社会制度“相似论”、两种社会制度发展方向“趋同论”、“改革趋同论”、“所有制趋同论”、“市场化趋同论”、“生产目的趋同论”、“生产力发展趋同论”、“政治制度趋同论”、“价值体系趋同论”。他们用“趋同论”干扰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企图使改革变成改向。

在我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是从这样两个方面散布和宣扬“趋同论”的：

1. 他们直接把“趋同论”的一些基本观点拿来传播，如关于“改革”的观点。他们认为，改革是世界性潮流，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在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从改革的历史发展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开始了内部机制的调整，采取包括实行计划经济、国有化等类似社会主义国家的多种“改革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自 50 至 60 年代逐步开始改革，直至 80 年代形成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改革浪潮，正是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效应”的结果。这共同的改革浪潮说明两种社会制度都在适应一种共同的要求：“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从双方改革的内容看，更说明二者发展的趋同。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股份公司、垄断企业，正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

观要求，这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国有化、社会计划也表明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化。

上面这些观点完全是搞自由化的人从“趋同论”那里照搬照抄过来的。

2. 他们宣称应当把“趋同论”作为一种认识问题的方法，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们称“趋同论”作为方法论，使人们第一次“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们认为，“趋同现象、趋同趋势”的出现表明我们的时代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对立和对抗，而是和平融合的“新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只是相互合作、依赖，不再有斗争，这甚至被许多人奉为“新思维”。他们讲，现实中并不存在马克思所讲的那种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封建社会，或至多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双方并不存在“取代”、“战胜”的关系，也不存在谁优谁劣和谁代替谁的问题。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宣扬“趋同论”，在我国国内造成了两个危害：一是阻碍了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进行；二是影响了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当今世界时代的历史格局。为了正确地认识时代的性质，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迫切需要对“趋同论”作全面分析。这就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本文从结构上共分七章，它们在逻辑上是相互衔接的。第一章主要从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竞争这一大的历史格局出发，分析“趋同论”萌生的社会历史、现实根源以及思想根源，然后分析它

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第二章转入概括“趋同论”的理论内容，梳理它衍生出来的各个流派，理清它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第三章开始系统剖析“趋同论”的哲学观、方法论、逻辑起点。第四章全面批判“趋同论”的三大理论及其他观点。第五章分析了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第六章分析了两种社会制度不能趋同的根本原因。第七章介绍了某些西方学者对“趋同论”的异议、驳难及其实质，介绍苏联学者对“趋同论”的认识及其演变。最后，指出了“趋同论”的历史命运。当然，以本文有限的篇幅难以构筑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第一章

---

### “趋同论”的萌生和嬗变

1917 年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苏维埃制度的建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引发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地球上两种最主要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怎样处理？其各自命运和发展前景如何？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诞生非常恐惧与恼怒，因此，从苏维埃政权出现的第一天起，资产阶级就竭力想把它消灭掉。1918 年 7 月 2 日协约国最高军事会议通过关于干涉俄国的决议，声称：“协约国迫切需要立即对俄国（指俄国资本家——摘者注）进行军事援助……作为解放俄国的第一步。”<sup>①</sup>当时任英国大臣的丘吉尔把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他狂言“对布尔什维克要干戈相见”，必须把“布

<sup>①</sup>《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432~433 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尔什维主义扼杀在摇篮中”<sup>①</sup>。在这种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包围社会主义孤岛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学者绝对不会去想什么“趋同”、“合流”，他们从理论上千方百计论证社会主义是“怪胎”、“早产儿”，没有存在的现实必然性，会很快自灭。但资产阶级卡桑德拉式的预言落空了。1920年前后，苏俄人民在俄共（布）的领导下粉碎了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纠合 14 国的军队对苏俄进行的武装干涉，开始进行大规模和平建设。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列宁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他在 1919 年 12 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讲，“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sup>②</sup>。为了实践这一思想，苏维埃俄国于 1922 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 19 日参加了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苏俄参加热那亚会议的“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sup>③</sup>。但“在欧洲，当然，是在各资产阶级国家，人们很喜欢在头脑里装满或者说塞满有关热那亚问题的种种无聊的议论”<sup>④</sup>。资产阶级学者认定可以通过和平共处、发展贸易的方式将苏维埃俄国搞掉，这里已有一些“和平演变”理论的萌芽。列宁指出，协约国是用商业、用投机倒把来进行战争，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而这种“和平演变”论又间接地为后来的“趋同论”准备着养料。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不会产生“趋同论”。

[苏]特鲁汉诺夫斯基：《丘吉尔的一生》，170～174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37 卷，35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④ 《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43 卷，70、6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从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末、40 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部门，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40 年与 1928 年相比，重工业增长了 9 倍，轻工业增长了 3.1 倍。这大大增强了苏联的综合国力，提高了苏联与资本主义抗衡的力量。这使资本主义西方感到了极大威胁，它们力求假借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之手，将社会主义一举扼杀。资产阶级学者则为以战争消灭社会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但社会主义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更加生气勃勃。这样，到 50 年代末，面对着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存力、初步的发展和内蕴的巨大潜力这三重历史力量，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并试图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揉合在一块，塑造出一个“混合社会”，“趋同论”由此产生并泛滥开来。当时的西德总理康·阿登纳曾对尼·赫鲁晓夫讲：“我亲爱的赫鲁晓夫先生，不出 100 年，将不用再谈论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了。”可见，“趋同论”是在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发展到一定条件下产生的。

## 第一节 两种制度并存竞争与

### “趋同论”的出现

“趋同论”的出现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竞争这一历史格局是密不可分的。

两种制度并存竞争的基本特征是：（1）地球上有两种最主要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并存的局面不是一种偶然的插曲，而是一个历史过程。（2）这两种社会制度在进行着比吸引力、比优越性的激烈的竞争；（3）竞争的性质是

谁战胜谁的问题，资本主义凭借其处于发达阶段、掌握着巨额财富的暂时的表面优势，力图战胜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则利用自身作为新社会制度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力求在各个方面战胜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仍然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和平并存”是现象，“竞争淘汰、竞争取代”是本质。

面对这一世界性格局，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政党及其代表人物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在共处中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先是提出武装颠覆的战略，继而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在共处中对社会主义进行“演变”，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了“和平改良”的主张——在共处中将两种制度揉合起来。“趋同论”正是在下述三大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歪曲了社会主义“和平共处”理论，把“和平共处”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融合”；它适应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需要，把自己当做“和平演变”的工具；它适应了社会改良主义的需要，把自己当做麻痹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工具，社会改良主义的泛滥导致“趋同论”的产生。

这里我们只分析前两个问题：“和平共处论”怎样被曲解成“趋同论”？“趋同论”与“和平演变论”是怎样的关系？第三个问题即“趋同论”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进行专门分析。

一、“趋同论”歪曲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实质，以“共处”为名，力求将社会主义“融合、趋同”为资本主义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

制度，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团结，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非常仇视和恐惧，他们也组成阵营，掀起对社会主义的“冷战”，用庞大的军事力量封锁社会主义，企图用“冷战”的手段将社会主义消灭，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使这些企图失败了。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冷战”开始缓缓解冻。1952年4月，斯大林在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讲：“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sup>①</sup>1954年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共同倡导了“潘查希拉”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要求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对当时国际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所作的公开报告中，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苏联战略原则。赫鲁晓夫认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大战不是不能避免的。他提出：共产主义可以不通过战争而赢得全世界，它可以在经济上通过发展击败资本主义。他说：“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确信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sup>②</sup>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赫鲁晓夫提出应大力发展苏联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贸易和非意识形态合作。1952至1962年10年间，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大致上增

《斯大林文选》，1版，下册，6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② [苏]赫鲁晓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载《真理报》，1956—02—15。

加了 3 倍。1952 年，苏联同西欧、北美和日本的贸易值为 7 亿美元，1962 年达 24 亿美元。赫鲁晓夫还多次谈到：“战前我们和美国的企业家（例如福特）以及和美国大公司（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曾有过良好的关系。”<sup>①</sup>1958 年 6 月，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有意购买几十亿美元的美国机器来帮助实现它的发展化学计划和建造一系列的苏联消费品工业。在苏联“和平攻势”的影响下，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有所缓和，美国甚至准许苏联 1959 年年中在纽约举办了一个大规模展览会。东西方关系在 50 年代末趋向缓和。

“趋同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产生的。“趋同论”者看到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理论在西方世界有深远的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经历了二次大战后，都对帝国主义战争深恶痛绝。为了抵消“和平共处”理论的影响，“趋同论”者移花接木，打着主张世界和平的旗号，将“和平共处、竞争取代”歪曲为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融、相互趋同”。而且应当看到，赫鲁晓夫在 50 年代末提出的“和平共处”论包含有可为“趋同论”利用的因素。赫鲁晓夫片面强调“共处”、“合作”，很少讲“斗争”。这就使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消除了。资产阶级学者则利用这一心理，提出两种制度“趋同论”。

“趋同论”认为通过两种经济制度的不断交往与技术合作的不断发展，就会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实现它们之间的趋同、合一，从而实现世界真正的和平。“趋同论”认为真正“经济趋同”的产生就可以避免战争冲突，要想消灭战争，就必须实现两种制度之

[苏]赫鲁晓夫：《同美国商界的谈话》，载《真理报》，1958—05—10。

间的经济趋同。丁伯根多次提出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可以消除世界上的一切军事对抗，为此，他大力呼吁发展两种制度之间的“超意识形态合作”，以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加尔布雷思也宣传通过“趋同”建立世界和平，他在《新工业国》（第四版，1985年）中称：两种制度在计划体系上的“趋同”的产生“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现在，或许在晚些时候，人们就会这样想。趋同将抛弃基于不可调和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观念。这是人们刚刚开始赞同的。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趋同。……大讲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把世界分成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自由企业与共产主义企业的双方，都同样地被一种教条式的信念所禁锢，这种信念就是：不管自由企业发生怎样的革命，都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承认计划体系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会趋同，就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可以使人们在所面临的军备竞赛方面的共同危险上达成协议，达成结束或使军备竞赛更温和的协议”<sup>①</sup>。

“趋同论”提出的通过“趋同”的方式实现世界和平的理论在西方社会中有很大影响，许多人都被它的这一新奇的“科学观点”所迷惑，认为“趋同论”的看法是可行的。如经济学家彼得·维尔斯说：“由于纯粹防务的需要，两种社会制度将趋向同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趋同论”这一看法有两个错误：其一，把“和平共处”曲解为“和平融合”。“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没有斗争，

① Galbraith. *New Industrial State*. Fourth ed. Boston: Marlin Publishing House, 1985. 405~406P.

② Peter Wales. *Prediction of Communist Economic Ac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1971. 75P.

社会主义正是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处中进行斗争，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其二，把“趋同”当做实现世界和平的唯一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因此，战争的消除、世界和平的永久取得只有一个条件，即消灭资本主义，而不是什么“社会趋同”。

二、“趋同论”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而产生的

5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资产阶级有鉴于战争政策的一再失败和“遏制政策”的一再碰壁，才不得不接受和平共处这一历史现实，调整其外交政策。但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没有什么改变，“亡社会主义之心未死”，因而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依然如旧。他们的政策调整，不是根本目的的变化，仅仅是战略策略的变换，即把反对社会主义的战略重点由战争手段转向“和平演变”。因此，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资本主义掀起了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的浪潮。

“和平演变”又称“解放政策”。它的制定者是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3年，他上台伊始就宣称对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更为有力或更为生动”的“解放政策”代替那“无效的‘遏制政策’”。他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即“和平的方法”来实现。所谓“和平的方法”，就是通过“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使“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缩短共产帝国主义的预期寿命”。

从杜勒斯以后，历任美国政界要人紧锣密鼓地奢谈“和平演变”。艾森豪威尔1956年4月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上讲话时，要求美国的报纸大力宣传“和平演变”。他声称：“我们的国家必

须领导——在全世界领导，使我们的自由地区不断扩大，不让共产主义乌云逐渐席卷我们。”他在另一篇讲话稿中说“共产主义专制”将和平演变为“自由民主”，他讲：“我们不能怀疑，世界历史的潮流正在趋向自由。最后，独裁和专制一定要消灭……人类的这些伟大理想将会实现——但是只有人们专心致志的努力才会实现。”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界要人感到“证明了政府‘解放政策’的正确”。杜勒斯于是宣称美国的政策就是促进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和自由化。他在1957年7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的政策的执行是根据这样一种假设——作为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就是自由政府终将获胜，而专制政府终将破产。”这种假设适用于社会主义“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大概是演进性的”。演进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自由化”。1958年12月，杜勒斯在加州商会发表演讲时称：“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年前在巴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说明了他认为是自由世界的政策。他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有一种获得胜利——这不是打败任何国家人民而得的胜利，而是为了所有国家人民取得的胜利——的高尚战略。这就是我们全力以赴地执行的战略。”

后来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在1959年11月的一次演说中称应当用“和平演变”的方式使印度战胜中国。1960年10月，他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讲：“我们的任务是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这是一种期望演变而不

是期望革命的政策——是一种依靠和平而不是依靠战争的政策。”

正是在美国政界要人的一再鼓噪下，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一时期掀起了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黑风恶浪。“趋同论”也正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需要应运而生。“趋同论”是一种特殊的“和平演变论”，它旨在通过宣扬“不偏不倚”的所谓“社会趋同”，使社会主义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资本主义。如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公开讲：“所谓趋同论的主要之点实质上不在于它倡导什么趋同，而在于它能把敌对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吸收掉、融化掉。”<sup>①</sup>真可谓一言破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进行具体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

## 第二节 “趋同论”的理论渊源

“趋同论”是在两种制度并存竞争的历史格局中适应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和平演变”战略的精巧理论化。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曾经称丁伯根的“趋同论”是“很富于想象力的、创新的”理论。但不管怎样精巧、富有想象力与创新性，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一方面是对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对以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说，“趋同论”有自己的思想渊源。那么“趋同论”有哪些思想渊源呢？

美国研究“趋同论”的专家格奥利认为：“趋同论”是对 20 世

<sup>①</sup> Golly. *Convergence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merica: Miami Publishing House, 1973. 59P.

纪以来许多理论诸如“福利国家论”、比较经济学、混合经济论等的综合吸收与发展。“趋同论”的代表人物丁伯根承认福利经济学是自己分析经济趋同问题的工具。他在1964年写的《福利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中就讲,“福利经济学是最理想的科学”,它应当“被普遍地视做有用的分析工具(包括对趋同的分析)”<sup>①</sup>,福利经济学是“趋同论”的第一个思想渊源。“趋同论”的第二个思想渊源是比较经济学,因为一方面早期的福利经济学与比较经济学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按照比较经济学家埃冈·纽伯格和威廉·达菲的说法:“比较经济体制领域中一个最有普遍性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假设即趋同假设。”<sup>②</sup>“趋同论”正是对不同经济体制进行比较而产生的结论。“趋同论”的第三个思想渊源是市场经济理论与“混合经济”理论。第四个渊源是民主社会主义。

### 一、“福利经济学”是“趋同论”最重要的思想渊源

福利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思潮的一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1920年,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庇古发表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它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sup>③</sup>。1937年底古发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50年代,他又写成《福利经济学的几个方面》一书,系统阐述了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有两个理论对“趋同论”影响

[荷]丁伯根:《福利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意义》,载《经济学译丛》,1982(5),63~65页。

②[美]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比较经济体制》,1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③ Economics Magazine, September 1964, 544P.

很大：

1. “收入均等化”论。福利经济学认为要想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大，就应使收入趋向均等化，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庇古说：“在福利经济学中有两个命题，粗浅地讲，即第一，对于一个人的实际收入的任何增加，会使满足增大；第二，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给穷人会使满足增大。”<sup>①</sup>福利经济学认为收入均等化会增加社会福利的根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一个人收入越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越小。庇古由此讲：“假如有一个富人和十个穷人，从富人手中拿出一镑钱，并把它给予第一个穷人，总满足量就增加了，但是富人还是比第二个穷人富，所以再转移一镑钱给第二个穷人，就又增加了总满足量。如此转移，直到原来的富人不比其他任何人富裕为止。”<sup>②</sup>收入转移的方法就是由政府向富人征税，再补贴给穷人。“趋同论”的“收入均等化”论正是来源于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论。

2. 最优经济制度理论。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认定客观上必然存在着一种最优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特点是通过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使社会生产、交换达到最优化，从而使整个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经济福利最大化有三个条件：（1）个人的边际收益等于它的边际费用；（2）所有个体的总报酬等于社会商品的总的费用；（3）所有个体边际收益的总和等于社会商品的边际费用（成本）之和。福利经济学认为只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使资源配最优化，就可以使上述三个条件建立，从而实现最优制度。庇古甚至认为通过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方面的措施，可以使资本主义渐

①②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51. 293, 294P.

进为社会主义。“趋同论”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如丁伯根讲“趋同论”“试验几套既定的制度并找出可以导致最优福利水平的一套”。

## 二、比较经济学包含有“趋同论”的基本结论

比较经济学对“趋同论”的影响较为复杂。我们看一下比较经济学的产生过程及其内部论争，就会明白这一点。比较经济学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形成于 30 年代中后期。1934 年美国经济学家康芝斯发表《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角度进行研究，书的最后一章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对经济体制作了最初的比较。1937 年，庇古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1938 年，美国经济学家劳克斯和胡特发表第一本《比较经济制度》教科书，把世界经济制度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四类进行比较分析，这使比较经济学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比较经济学的萌芽却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开始的对社会主义的争论。这一争论明显地分为两派，沿双线展开，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次争论发生在 19 世纪末到 1917 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1874 年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谢费尔发表《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文，他认为社会主义如果将价格建立在价值理论上，而不考虑使用价值，它就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建立合理、有效的经济体制。到 19 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根本缺陷是不能正确估价生产要素，它不能正确地指导生产。1902 年，荷兰的皮尔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商品流通和交换，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经济。这一派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存在的合理性。